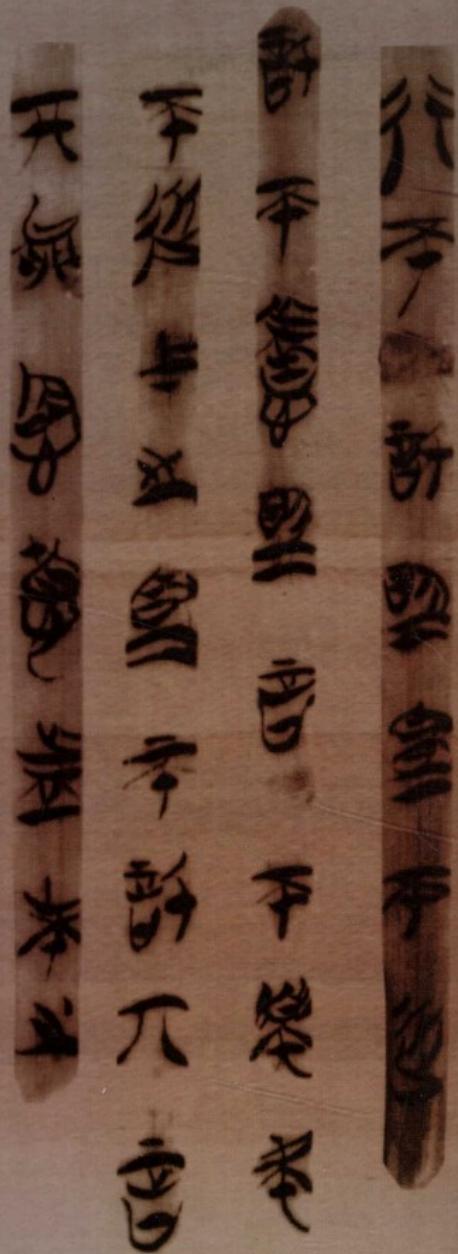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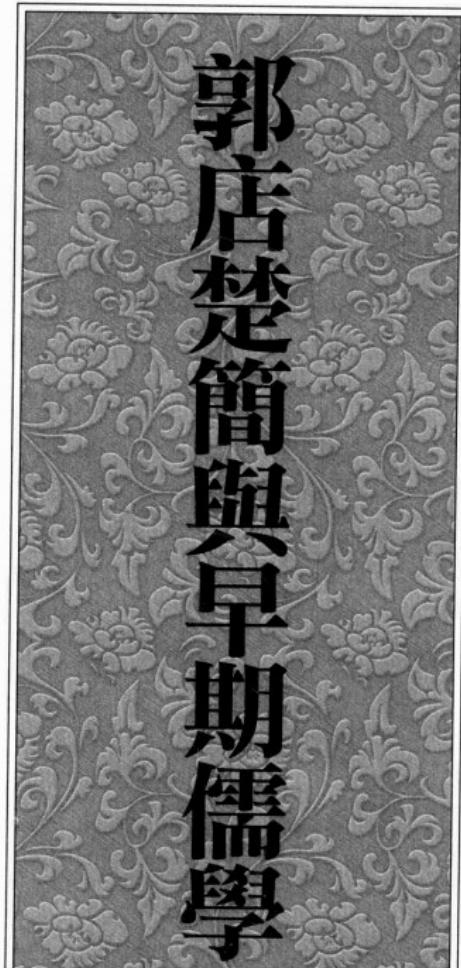
龐樸等／著

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

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十二)



文獻研究叢書(十二)
出土思想文物與



龐樸等／著

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龐樸等作；初版。—臺北市：
台灣古籍，2002[民 91]
面： 公分—（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II）
ISBN 986-7939-22-0（精裝）

1.簡牘 2.儒家

796.8

91005051

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十一）

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

作 者 龐 樸 等
編 輯 謝 嘉 容

發 行 人 楊榮川
出 版 者 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408號
地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三三九號四樓
電 話：02-21270550
傳 真：02-21270661
郵政劃撥：18813891
網 址：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tcp@wunan.com.tw

二〇〇二年五月 初版一刷
定 價 新台幣 九〇〇
元 整

PDG

編者弁言

西元一九九三年十月，湖北省荊門市沙洋區四方鄉郭店村的一座無名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簡。經整理辨認，得一萬三千餘言，全部為學術著作。全文於西元一九九八年五月以《郭店楚墓竹簡》名目公佈於世。

這批竹簡的形成年代，正巧約當前人哀歎為「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顧炎武）的戰國之初那百多年間。所以《郭簡》剛一出版，立即引起國內文史哲界及國際漢學界的極大興趣。一時間，各種大小型討論會議紛紛召開，無數長短篇學術論文頻頻傳誦；人們普遍相信，不僅史文所闕軼的孔孟之間概況得以由此推定，而且，整個先秦學術史，或亦將因此而洞澈透明。所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批簡文的出現，是近百年簡帛學史上的一件特大喜訊，其重要性是怎樣估計也不會過份的。

只是，要想使這種重要性得以準確地發掘出來，並為學術界所普遍瞭解與認同，就很需要有一塊專門的園地，以供大家廣泛地發表見解；並且要有一種手段，以使這些見解快速地傳播開去。於是，有了創立「簡帛研究」網站的設想。

創立網站的設想得國際儒學聯合會的贊成而實現，賴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而健壯。一年多來，網站由研究郭店楚簡開始，逐步向一切出土文獻問津，已發佈學術論文七十餘篇，各種資料三四十種，成為有關學界人士的得力助

手和親密朋友。

今年二月，網站（<http://www.bamboosilk.org>）創立周年之際，台灣古籍出版公司更從海峽對岸伸來援助之手，願意出版網上的首發文章，以使諸種高見得以永遠保存。於是，乃有本文集的問世。

文集諸文選自「簡帛研究」「網上首發」欄西元2000年2月至西元2001年2月間，共編為二冊，其一曰《古墓新知》，主要選錄直接研究郭店簡文的篇章；其二曰《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主要發表由郭店簡引申出來的研究，兼及一些其他簡牘。這些文章，其觀點為各位作者所有，本站未敢掠美；但諸文同聲相應，亦足以顯現出本站的基本面貌與心聲。

像一切新出現的事物一樣，文集也不僅是過去過程的結果，而且必將開拓出新的旅程，帶動地下出土文獻的研究活動，以更快的手段在更廣的領域內，前進！

龐 樸 劉貽群

西元2001年8月，北京

目 錄

第一章	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	姜廣輝	1
第二章	郭店儒簡研究的參考座標	姜廣輝	13
第三章	《論語》·《論語》類文獻·孔子史料—— 從郭店簡談起	郭 沂	25
第四章	郭店簡與《大學》	梁 潤	61
第五章	《中庸》·《子思》·《子思子》——子思 書源流考	郭 沂	75
第六章	郭店楚簡與《中庸》公案	梁 潤	85
第七章	釋《五行》與《繫辭》之「型」	劉信芳	115
第八章	楚地心性學與郭店儒家簡及子思之學南傳探 析（節選）	鄧建鵬	123
第九章	論子思學派對禮的理論詮釋	彭 林	129
第十章	三重道德論	龐 樸	147
第十一章	「仁」字臆斷——從出土文獻看仁字古文 和仁愛思想	龐 樸	163
第十二章	郭店儒簡與告子學說	陶 磊	169

第十三章	「反善復始」淺探	歐陽禎人	177
第十四章	《老子》「同文複出」現象的初步研究 寧鎮疆		187
第十五章	上博《詩論》一號簡讀後	朱淵清	201
第十六章	上海博物館所藏《詩論》第一枚簡的釋文 問題	范毓周	203
第十七章	試析已公佈的二支上海戰國楚簡	曹峰	209
第十八章	長台關楚簡《申徒狄》研究	李零	229
第十九章	「三閭大夫」考——兼論楚國公族的興衰 李零		245
第二十章	王家台秦簡《歸藏》管窺	廖名春	259
第二十一章	《為吏之道》的儒家思想發微	歐陽禎人	273
第二十二章	敦煌文獻與中國歷史研究	寧可	283

第一章

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

姜廣輝

顧炎武曾指出，周貞定王二年（西元前四六七年）至周顯王三十五年（西元前三三四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間「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日知錄》卷十三《周末風俗》）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史文闕軼」的情況呢？孟子曾說「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這是說一些對諸侯不利的文獻典籍被人為地有意地毀掉了。當然，「史文闕軼」可能也還有別的原因。

顧氏所說的時代正是孔子之後七十子及其後學的時代。正因為「皆去其籍」、「史文闕軼」，以致於韓非所說的「儒分為八，墨離為三」等先秦思想史的具體情形，我們不甚了了，所知甚少。

郭店一號墓的下葬時間，考古學界初步確定為西元前三五〇年——三〇〇年，墓中的文獻成書年代應當較墓葬時間為早，正是顧炎武所說的「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的時期。《郭店楚墓竹簡》的出土正好可以補某些「闕軼」。

當然，《郭店楚墓竹簡》並未給我們提供確鑿的材料使我們得到所期待的確定的結論，我們所能得到的不過是些蛛絲馬跡，這需要結合前人的研究來深化或修正一些已有的認識。

一、早期儒學的分派

韓非子說：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其說語焉不詳。以今考之，孔子的學生中學問成就最高，從而成為大宗師者有三人：一為子游；一為子夏；一為曾子。茲略述之：

(一)子游一系，可稱為「弘道派」

《禮記·禮運》所述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說係子游所記。在孔門中，子游所傳理想最為高遠，議論最為深闊，所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子游可謂孔門之大賢。子游、子思、孟子一脈相承，這一派秉承孔子「天下為公」的思想，主張「君宜公舉」，「民可廢君」。在早期儒家之中，這一派人民性、主體性、抗議精神最強，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堅。郭店楚簡儒學部分多半是子思一系所作，其中《唐虞之道》一篇歌頌堯、舜「禪讓」的盛德；而《性自命出》一文錄有子游的一段遺文。子思、孟子出於子游，荀子已先言之。《荀子·非十二子》說子思、孟軻「案飾其言……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這從側面說明子游、子思、孟子為一派。宋代朱熹等理學家出於建構「道統」論的需要，虛構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統」系譜，認為子思出於曾子。對此康有為正確地指出：「著《禮運》者，子游。子思出於子游，非出於曾子。顏子之外，子游第一。」（《康南海先生口說·禮運》）「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有《史記》可據。子思受業曾子，無可據。子思作《中庸》，精深博大，非曾子可比。惟孟子確傳子思之學。子思高出於曾子。」（同上書，《孔子改制一》）章太炎也辯子思不師曾子說：「宋人遠迹子思之學，上隸曾參。尋《制言》、《天圓》諸篇，與子思所論述殊矣。《檀弓》記曾子呼伋，古者言質，長老呼後生則斥其名，微生噲亦呼孔子曰丘，非師弟子之徵也。《檀弓》復記子思所述，鄭君曰：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太炎文錄·徵信論》）

(二)子夏一系，可稱為「傳經派」

子游、子夏在孔門中以通曉文獻典籍著稱，《論語·先進》說「文學：子游、子夏。」但子游教育學生注重「上達」功夫，子夏

教育學生注重「下學」功夫。子夏一派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對原典的全面研習有很大貢獻。後來的荀子除繼承子弓一系外，也繼承了子夏一系的學說，成為傳經之儒。漢以後經學的發展，主要是這一派的推動。這一派比較注意與統治者的合作，與子思、孟子一派的抗議精神和批判精神不同。康有為說：「傳經之學，子夏為多。」（同上書，《學術源流七》）「傳經之功，荀子為多。」（同上書，《學術源流二》）「孟子之後無傳經。……二千年學者，皆荀子之學也。」（同上書，《荀子》）

（三）曾子一系，可稱為「踐履派」

主要人物有曾子（曾參）及其子曾申（在《禮記》中有時曾申亦被稱為曾子）、其弟子樂正子春等。這一派重孝道的踐履，其基點落在家庭父子關係上。這一派所講的「孝道」是廣義的。曾子認為，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甚至不以時伐山林、殺禽獸等，會給父母帶來惡名，皆不可謂孝。這一派也講天道陰陽問題，可能是儒家最早重視陰陽問題的學派。康有為說：曾子之學守約，治身篤謹；曾門弟子宗旨學識狹隘。但他又說：「曾子得成就為孔學大派，皆弘毅之功，力肩孔道為己任也。……曾子蓋能行而後言者，雖守約，亦可法矣。」（《論語注》頁一一二）在《郭店楚墓竹簡》中《尊德義》有孔子語而未稱引孔子：「德之流，速乎置郵而傳命。」此在《孟子·公孫丑上》中則明確稱引孔子：「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尊德義》之所以有孔子語而未稱引孔子，有學者認為是孔子自作。同理，《窮達以時》中有一段話，未說明是何人所說，而《荀子·宥坐》與《韓詩外傳》卷七都稱「孔子曰」，亦認為是孔子所作。在《性自命出》一文中有「喜斯陶，陶斯奮，奮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喜之終也。慍斯憂，憂斯戚，戚斯歎，歎斯舞，舞斯慍，慍，慍之終也。」這段話亦見於《禮記·檀弓下》，稱子游所說，其文為：「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

歎斯辟，辟斯蹠也。」北宋劉敞已疑其中有闕文。另外，這批竹簡中，如《魯穆公問子思》、《緇衣》、《五行》等篇當與子思有關。

《荀子·非十二子》已隱言子思之學由子游上溯孔子，這已是當時儒者較為普遍的看法。而孔子、子游、子思的思想作品同存於這批楚簡當中，是否說明這批竹簡主要是子游、子思一派的作品？

二、早期儒學的經典

大家知道，儒家經典為「六經」。經學史上常用以下兩條材料指陳「六經」的原始出處，一是《莊子·天運》記孔子對老聃之言：「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為文。」二是《禮記·經解》，篇中依次論列《詩》、《書》、《禮》、《樂》、《易》、《春秋》的教化功效，雖未逕稱此六書為經，然既以「經解」名篇，似亦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

上述兩條材料，一條明言「六經」，一條隱言「六經」，但學者於此總未能心安，原因在於，對《莊子·天運》以及《禮記·經解》的年代問題不能確切考訂。莊子「寓言十九」，其說未必可信；其書中各篇亦未必皆其自著。南宋黃震說：「『六經』之名始於漢，《莊子》書稱『六經』，未盡出莊子也。」（《黃氏日抄》卷五五）近代學者羅根澤撰《莊子外篇探源》，認為《天運》是漢初作品。《莊子·天運》或係晚出，但亦不足證明先秦一定不能出現「六經」字樣。

《郭店楚墓竹簡》中提供了兩條新資料，對解決上述問題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說：「《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詩》所以會古今之詩也者；《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禮，交之行述也；樂，或生或教者也；……者也。」

(二)《郭店楚墓竹簡·六德》說：「夫夫，婦婦，父父，子子，

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職而亡由作也。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

考古學界確定郭店一號墓的下葬年代在西元前三〇〇年之前，學術界亦認為墓中資料當在孟子之前。上述兩條材料中都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者相提並論（其中第一條材料略殘，可推知是講《書》），雖未明言為「六經」，說明在孟子之前的年代，這六種書的內容已經為孔門儒者所研習了。其中第二條材料尤顯重要，我們可以從中分析出如下意義：第一、六經雖為體裁很不同的六種書，但還是有其共同的思想傾向，即都重視夫婦、父子、君臣的倫常關係。第二、可以印證先秦原本有《樂經》的看法。六經中的《樂經》至漢代失傳，對此，歷史上曾有兩種解釋：古文經學認為《樂經》毀於秦火；今文經學認為樂本無文字，不過是與《詩》、《禮》相配合的樂曲。在我們看來，樂只有樂曲而無文字，是不可思議的；今《禮記》中的《樂記》應是解釋《樂經》的說記，《樂》若無經文，又如何有「記」？而從上面的第二條材料看，若樂僅是樂曲，如何從中來「觀」夫婦、父子、君臣的倫常關係？由此看來，古文經學認為先秦原本有《樂經》的看法可能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由上可知，在孔子之後儒家學者已將《詩》、《書》、《禮》、《樂》、《易》、《春秋》作為研習科目；加上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已多有立「經」之事，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即使《莊子·天運》關於「六經」的說法不足據，「六經」之名實已呼之欲出。關於《尚書》原典，先秦的儒家學者喜歡援引《詩》、《書》，《書》即《尚書》，《尚書》到底有多少篇？《尚書》緯《璇機鈐》說：「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去三千一百二十篇。」緯書之說，謬悠難信。而《漢書·藝文志》說：「《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孔子定《書》百篇之數，亦不可深信。惟《史記·儒林傳》說：「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

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我們可以相信，《尚書》絕不僅僅只是二十九篇，在此之外，至少還有數十篇，只是篇名與內容為何，我們已不得而知。

簡本《緇衣》除了引用孔子的話之外，例皆引用《詩》、《書》之語，其中引《尹誥》一次；《君牙》一次；《呂刑》三次；《君陳》二次；《祭公之顧命》一次；《康誥》一次；《君奭》一次。這些篇名及其中的內容無疑都是《尚書》原典的內容。下面就其中的內容作些分析，以便從中捕捉《尚書》原典的資訊。

(一)《祭公》或稱《祭公之顧命》，不見於傳世本今、古文尚書，而見於《逸周書》。《尚書》本可分「虞、夏書」、「商書」、「周書」三部分。按《緇衣》引書之例，推測《祭公之顧命》應屬《尚書》中的「周書」部分。祭公，字謀父，為周公之孫，周穆王時以老臣當國，此篇是祭公將死時告誠穆王之辭，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獻，原是列於《尚書》諸篇之中的。那為什麼歷代學者有這樣大的失誤，不把《祭公之顧命》作為《尚書》的內容呢？這是因為傳世本的《禮記·緇衣》誤將「祭公之顧命」的「祭」隸定為「葉」，變成了「葉公之顧命」，自鄭玄至孔穎達皆因錯就錯，以「葉」為本字，誤注為葉公子高。葉公子高是春秋末期人，這樣不僅時代相差太遠，人物的份量也遠遠不夠了。因此也就不會有人去想這可能是《尚書》原典的內容。

(二)以《緇衣》引書之例，《尚書》原典中有《尹誥》一篇。簡本《緇衣》引《尹誥》云：「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誥》原是《尚書》原典的一篇，應是伊尹告太甲之言。但傳世本《禮記·緇衣》將「誥」誤為「吉」字，這樣就好像是一位姓尹名吉的人所講的話。大約漢人發現古文尚書，其中有《尹誥》一篇，當時可能無篇題，漢人見其中有「咸有一德」之語，遂用以名篇。後此篇失傳，造作偽古文尚書者，便從傳世《緇衣》中抄撮「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之語，敷衍成篇。這就是偽古文尚書的《咸有一德》。不知《尚書》原典中「咸有一德」出自《尹誥》中。漢儒已誤，造作偽古文尚書誤信其說而造假，正好露出造假的破綻。

三、早期儒學的精髓

上已言及，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所代表的弘道派是早期儒家的嫡系與中堅，下面我們重點來考察一下弘道派的思想綱領。弘道派的主要思想綱領有三：一為「大同」說的社會理想；二為「禪讓」（或曰「擅讓」）說的政治思想；三為貴「情」的人生哲學。

(一)「大同」說

「大同」說見於《禮記·禮運》中孔子與子游的對話，孔子對子游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宋儒關於「大同」說曾有過一番討論。南宋經學家胡安國著《春秋傳》，屢引《禮記·禮運》「天下為公」，認為孔子作《春秋》有意於「天下為公」之世。呂祖謙寫信給朱熹表示不同意見，認為《禮運》中講「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為非孔子語。」（《呂東萊文集》卷三《與朱侍講元晦》）從這些話中不僅看出呂祖謙缺乏見識，而且連最基本的東西都弄錯了，因為《禮運》並未以堯舜時代為「小康」，而是將堯、舜時代歸為「大同」、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歸為「小康」的。以今日觀之，禹夏時代是私有制的國家產生之時，這是一個重要的分界，此前的「大同」之世是原始公產制的時代，以「天下為公」為準則，所以「不獨親其親，子其子。」這曾是一段歷史，先秦諸子多不懷疑這段歷史。呂祖謙見到老子、墨子稱述這段歷史的話，便認為《禮運》的「大同」思想是「老聃、墨氏之論」。到底還是朱熹多些見識，他在回

信中指出，《禮運》以五帝之世為「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為「小康」之世，是不錯的；並認為「小康」之世像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那樣的「大賢」就可以達到，而「大同」之世則需要有更大政治智慧的「聖人」如堯、舜才能達到。朱子雖有此見識，但並未認為「大同」說即是儒學「道統」的內容。

(二)「禪讓」說（附「湯革武命」說）

康有為曾揭示「禪讓」的意義說：「公天下者莫如堯舜，選賢能以禪讓，太平大同之民主也。」（《孟子微·總論》）「孔子最尊禪讓，故特托堯舜。」（《康南海先生口說·孔子改制二》）「禪讓」說是以堯舜禪讓為模式的政治權力轉移的主張，《郭店楚墓竹簡》中的《唐虞之道》即是闡明其意義的理論文章。「唐虞」即指唐堯、虞舜，儒家「祖述堯舜」，主要即在弘揚堯舜「天下為公」的政治品德。《唐虞之道》開篇即說：「唐虞之道，（擅）而不傳。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擅）而不傳，聖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賢仁聖者如此。」「禪讓」說在孟子那裏有進一步的解釋。孟子說舜有天下是「天與之，人與之」，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只是虛懸一格，歸根到底是「民與之」。「與」即是大同說的「選賢與能」之「與」，其繁體字形作「與」，與「舉」字形、音、義皆相近，以「與」、「舉」解之皆可通。就是說君主的權力是民眾給與的，民眾本有選舉君主的權力。可以說，這是中國古代帶有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

另一方面，儒家又盛稱「湯武革命」，認為君主若「德不稱位」，甚至殘虐臣民，臣民有革命的權利。孟子和荀子都有這樣的看法。

(三)貴「情」說

《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有一套相當完整精致的心性理

論。《性自命出》指出人類有「自由意志」，這是與天地間所有生物不同的特點：「凡人雖有性，心無奠志。」這種「自由意志」又有其特點：「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奠。」人的個性在形成過程中，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外物引誘、內心嗜好、時勢引導，傳習沿襲、友朋樣榜、道義激勵等等，因此個性的形成也就有多種發展的可能性。然而人是一種群體生活的動物，在群體生活中，要做到共存共生，人類社會便需要一些最基本的行為規範即儒家所說的「道」和「禮」，但怎樣的「道」和「禮」才是最符合人性，最能使人心悅誠服的呢？由此《性自命出》提出了它的心性理論的核心思想，即貴「情」的思想。我們來看看它是怎麼說的：

1. 「道始於情，情生於性。」
2. 「禮作於情。」
3. 「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
4. 「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
5. 「信，情之方也。情出於性。」
6. 「用情之至者，哀樂為甚。」
7. 「凡人，情為可悅也。苟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苟有其情，雖未之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有情者也。」

在《性自命出》的作者看來，合乎情的「道」和「禮」即是群體的價值取向，這也便是教育的內容，而教育可以引導個性的健康發展，由自然的可能性走向必然的合理性。社會政治建立在「人情」的基礎上，是人們所樂於接受的。以「人情」為基礎，即使做錯了什麼事，也會得到大家的原諒；不以「人情」為基礎，即使做了多麼了不起的事業，人們也不會覺得可貴。總之，不能離開「人情」而談社會政治的「道」和「禮」。「情」成了衡量善惡是非的尺度。這種思想與後來從漢儒到理學的「性善情惡」觀念完全相反。

由上所述，我認為以孔子、子游、子思、孟子為代表的儒學之「道」，主要是就上述「大同」說、「禪讓」說、貴「情」說而言

的。「大同」說反映了他們的社會理想，「禪讓」說反映了他們的政治思想，而貴「情」說則表達了他們的人生哲學。這三個方面可以視為孔孟儒學的真正「道統」。

四、重新審視儒學的「道統」說

《郭店楚墓竹簡》的發現可能導致儒學史乃至整個中國思想史的重寫和改寫。郭店楚簡所反映的是孔子之後一、二傳弟子的思想，透過它可以反觀孔子學說的核心思想。以此核心思想審察後世的「道統」說，便會對儒學傳統作出新的詮釋。

「道統」是指儒學的真精神、真血脈。「道統」說最初由唐代韓愈提出，此後又有各種各樣的「道統」說，而最具代表性和涵蓋性的是南宋朱熹的「道統」論。依朱熹的看法，「道統」的內涵或者說儒學的真精神是出自偽《古文尚書》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所謂「十六字心傳」；而「道統」的系譜或者說儒學的真血脈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此後千載不傳，直至周敦頤、二程方始接續孔孟的道統。

我的看法是，可以承認歷史上有儒家道統的存在，其內涵是由「大同」說的社會理想、「禪讓」說的政治思想和貴「情」說的人生哲學所構成的思想體系；後世繼承「道統」的不是漢、唐、宋、明的儒者，宋明理學家曾經宣稱他們發現了孔孟「道統心傳」，可是宋明時期幾個有代表性的心性理論，無論是朱熹的重「性」（性即「天理」）說，還是王陽明的重「知」（知即「良知」）說，抑或劉宗周的重「意」說，都不符合早期儒學的思想。

走出理學，始近「道統」。真正繼承「道統」的倒是以黃宗羲、戴震、康有為等人為代表的清代儒者。在這些思想家那裏，先秦儒學重視人民性、主體性、抗議精神的思想得到了弘揚，諸如重「情」說的人生哲學和「大同」說的社會理想也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得以重構和發展。